

主 编 黄留珠

本卷主编 卢 鹰

西安通史

第二卷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黄留珠

本卷主编 卢 鹰

西安通史

第二卷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上官吉庆

副主任 方光华 张 涌 王武平 惠应吉 任莉娟 曹永辉

委 员 王巨礁 薛振虎 蒋少宁 乔安涛 刘铁泉 王炳南

强晓安 李颖科 张新民 王碧辉 杨 宁 李宁君

陈松林 苗宝明 任立新 冯慧武 张永科 吕恒军

吴逸伦 刘顺智 张民伟 郑育林 白正谊 崔玉凤

崔 林 王军平 王作权 夏泽民 李长安 姚敏杰

张 帆 王 莹 文启湘 陈国庆 甘枝茂 王双怀

张应超 牛 昉 康志祥

《西安通史》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曹永辉 冯艳阳

副主任 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耀珍 杨军亚 姚文东 高 鹏 高长安 崔义萍

崔桂琴 富小云



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当（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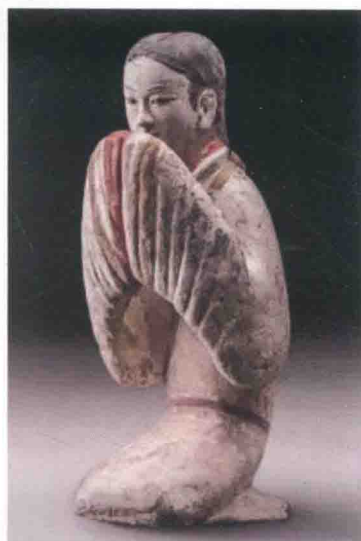
西汉早期凤鸟鎏金钟（西安市未央区文景路出土，西安博物院收藏）



汉长安城墙夯土遗址（郎丽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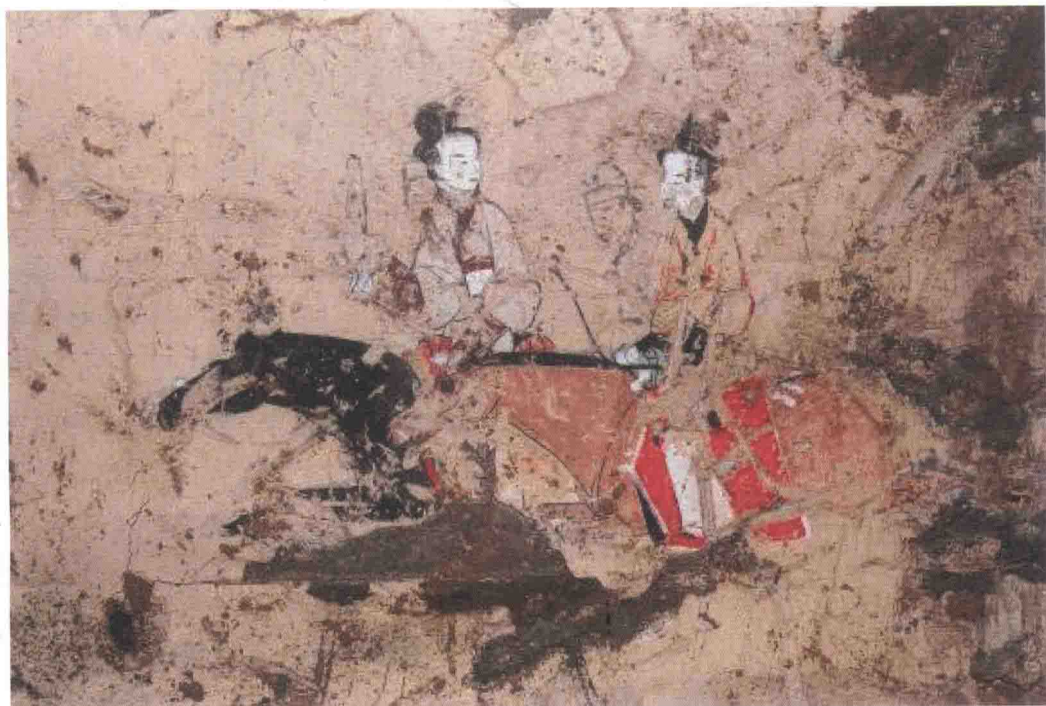
汉长安城长乐宫凌室遗址



汉阳陵出土的
塑衣式彩绘跪坐女俑



汉景帝阳陵出土的裸体俑



西汉骑马人物图（西安市出土 西安博物院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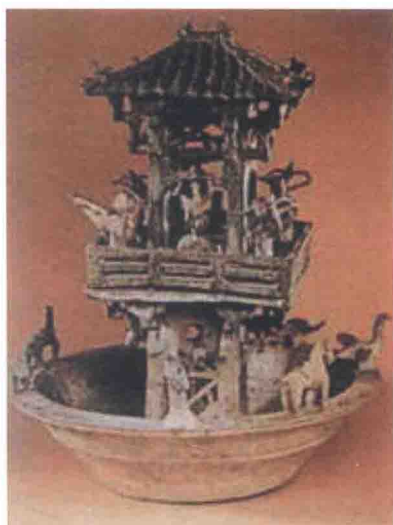
汉元帝渭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马
（咸阳市博物馆收藏）



霍去病墓前石雕——卧牛



鸠摩罗什讲经说法的草堂寺与舍利塔(郎丽君摄)



西安市新筑镇三里西
村出土的东汉绿釉陶水亭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西安市未央宫
乡出土的北周安伽墓
彩绘贴金浮雕石榻及
围屏图案(局部)

总叙

黄留珠

(一)

西安，周曰丰镐，秦曰咸阳，汉、唐曰长安，位于陕西省渭水盆地的中部偏南，具体经纬度为东经107度40分至109度49分和北纬33度39分至34度45分之间。从大地构造来说，渭水盆地属于鄂尔多斯台地南沿下沉地带，称作地堑。其海拔400米左右，大体东南高、西南与西北低，呈簸箕形状。

渭水盆地南为高耸的秦岭，北为莽莽的永寿梁，唯渭河流域低而平坦。渭河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河床宽、河道多，经长期泛滥与冲击，堆积成为冲击平原，即有名的关中平原，或称八百里秦川。这里土壤肥沃，在我国最古的地理学著作《禹贡》里被列为最高等级，所谓“上上”“黄壤”。以往研究者只笼统地认为，似乎这种土地富含腐殖质，故而肥美；现经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深入探讨，已经基本从源头上找到了黄土形成的原因，进而为我们揭示了其自肥的奥秘^[1]。在锄耕农业时代早期，这样的土地是最理想的。所以西安及周边的关中地区，很早就被称为“天府”“陆海”^[2]。

[1] 说详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二章《发生论：黄土地之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4页。

[2] “天府”作为地理名词，见于《战国策·秦策》。其中记纵横家苏秦说秦惠王一段话云：“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里，天府所指的是秦地。《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论证定都关中缘由亦云：“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里，天府同样也是指秦地。可见“天府”最早指的就是关中平原。“陆海”，指物产富饶之地。《汉书·地理志》云：“（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这表明“陆海”一词，最早也是专指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

西安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6°C 。年极端最高气温 $35\sim 41.8^{\circ}\text{C}$ ；极端最低 $-16\sim -20^{\circ}\text{C}$ 。全年以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6.1\sim 26.3^{\circ}\text{C}$ ，月平均最高气温 32°C 左右；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0.3\sim -1.3^{\circ}\text{C}$ ，月平均最低气温 -4°C 左右。年降水量平均 $507.7\text{毫米}\sim 719.8\text{毫米}$ ，年降水日数 96.6 天。降水年际变化很大，多雨年和少雨年雨量最大差值可达 590毫米 。降水的季节分配也极不均匀，有78%的雨量集中在5~10月，其中7~9月的雨量即占全年雨量的47%，且时有暴雨出现。年平均相对湿度70%左右。年平均风速 1.8m/s ，全年盛行风向为东北风。无霜期平均为 $219\sim 233$ 天。每年降雪日 13.8 天。^[1]

西安境内的山脉，主要是南部横贯东西的秦岭。其山势巍峨壮丽，自武功以东至蓝田以西一段总称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太乙山、地肺山、南山、秦山等）。西安适居它的怀抱之中，造成一种负山面水的形势。

秦岭在西安境内的主峰名南五台，位于西安南30多公里处。《关中胜迹图志》称“南山神秀之区，惟南五台为最”。山之清凉、文殊、舍身、灵应、观音（或名大台、大顶）五峰，因位在耀县五台山以南，故而取名南五台。

南五台东南有翠华山，距西安约23公里。山口有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修建的太乙宫，故亦名太乙山。相传太乙真人曾在此修炼。峰顶之太乙池，据说是唐天宝年间，山峰崩裂堵塞山水而成，又有龙移湫、澄源湫、太乙湫等别名。池附近有冰洞、风洞诸奇观，还有金华洞、玉案峰等名胜。

位于西安西南40余公里处秦岭北麓的圭峰山，因山峰挺拔突出如圭而得名，亦名尖山。其紫阁、大顶、凌云、罗汉等峰，皆突兀俏丽，形势险峻。北坡有落差200多米的高冠瀑布，亦一大景观。

骊山为秦岭由蓝田向西北伸出的一个支脉，位于西安东20余公里处，主峰在临潼南门外，故又名临潼山。其东西绵亘200余公里，最高峰海拔1256米，不仅是一处有着“骊山晚照”赞誉的秀丽景区，而且因其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为人们所向往；特别是山北麓以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为主体的秦文化遗存和以华清池温泉为代表的唐文化遗存，以及以五间厅、兵谏亭为代表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则更使之闻名遐迩，被推向了世界。

秦岭又多山谷。这是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亦即山脊间的低洼部分。秦岭北坡的山谷，凡谷口在山麓（山坡与周围平地相接部分）者称“峪”。其一般呈南北走向，南高北低。相传关中地区有秦岭七十二峪之说^[2]，而在西安境内者，则有四十九峪：自东向

[1] 近若干年，西安降雪日明显有减少之势。

[2] 秦岭陕西境内北坡的峪口，远远不止“七十二”个。清人毛凤枝《南山谷口考》书中即有东起潼关西至宝鸡，“考南山谷口北向者，凡得一百五十所”之说。所谓“七十二峪”云云，当指相对著名者而言。且究竟是哪七十二峪，还有不同的版本。

西依次为蓝田县9峪——清峪，道沟峪，流峪，赛峪，辋峪，岱峪，小洋峪，大洋峪，东汤峪；长安区17峪——库峪，扯袍峪，大峪，白道峪，小峪，土门峪，蛟峪，太乙峪，康峪，石砭峪，天子峪，抱龙峪，子午峪，黄峪，沔峪，祥峪，高冠峪；户县13峪——紫阁峪，神水峪，太平峪，乌桑峪，黄柏峪，化羊峪，曲峪，潭峪，竹峪，皂峪，栗峪，涝峪，甘峪；周至县10峪——耿峪，赤峪，田峪，就峪，团标峪，黄池峪，黑峪，西骆峪，车峪，泥峪。

西安四周穿流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号称长安八水（八川），均属黄河水系。西汉文豪司马相如曾描述此八水流经上林苑情状云：“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沣）、镐（滈）、潦（涝）、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向背而异态。”^{〔1〕}由此似不难想见一帧八水绕长安的壮观画面。前文已经指出，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其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山，东南流入陕西境横贯关中，至潼关入黄河。其他七水原本各自直接汇入渭河，后随时代变迁，浐水成为灞河的支流，滈水成为潏河的支流，潏河又成为沣水的支流。尤其是这些河流的水量，亦因气候的变化，古今差异很大。当前西安市启动八水润西安工程，旨在恢复当年八水绕长安胜景。

与河流相关的还有陂池。所谓“陂”，指自然汇集成的水塘；所谓“池”，指人工开凿的水塘。古代西安地区陂池很多，著名的如泂陂、皇子陂、周氏陂、昆明池、曲江池、龙池、龙首池、鱼藻池、海池等。今八水润西安工程建设的湿地，不少就是以古代陂池遗址为基础而修造。

北方习惯把高而平的地方叫作“原”。西安地区多这种地貌，尤以东、南两面为甚。这亦为西安自然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西安建设的发展，市区的“原”差不多已被夷平，但周边远郊者仍保持着莽莽雄浑势态。兹按由内而外的顺序述其主要者如次——

龙首原 位于今西安市龙首村未央区、新城区和莲湖区三区交界处。唐大明宫含元殿即建其上。

乐游原 位于今西安市大雁塔东北部、曲江池北面。其得名于西汉，唐时为著名风景区。历代文人吟咏作品极多，尤以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句，更为家喻户晓。

少陵原 位于浐河、潏河之间，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陵、杜曲、大兆之间，汉代称鸿

〔1〕《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7—2548页。关于“八水”，有人认为没有涝河，而有滈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八水中没有潏河，而有泂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正确。因为古时潏河与泂河其实为同一河流，都向北汇入渭河，但后来经人工改造，潏河向西汇入沣河，又称浞河（河北也有同名河流），而潏河的分支泂河向北汇入渭河。目前，泂河起自长安区水寨村，流经长安区申店、韦曲、杜城进入西安市区，再经丈八沟、北石桥、三桥、六村堡至草滩入渭河。全长32公里，西安市区段长27.4公里。

固原。

白鹿原 位于灞、浐两水之间，长20余公里，南连秦岭。原面上以鲸鱼沟为界切割为南原（也叫炮里原）、北原（也叫狄寨原）。当代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即写此地的人和事。

铜人原 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以东，临潼区斜口以南，今名洪庆原。相传曹魏明帝欲将秦时所铸两铜人运往洛阳，至此重不可致，只得弃留原下，故得名。系骊山山前高于灞河、渭河四级阶地的台塬。

神禾原 位于西安南15公里处，为樊川、御宿川间的高地。南起长安区王曲北江兆村，北至何家营，贾里村等地。相传原上曾产过六斤重的谷穗，故以“神禾”名之。

细柳原 其得名可能与汉代将军周亚夫的细柳营有关。史载汉文帝时在灞上、棘门、细柳置军防备匈奴，文帝劳军至前两处时皆“直驰入”，并受到“迎送”，但至细柳军却被阻“不得入”，后按严格的程序，成礼而去；文帝为此大发感慨，称赞细柳军的统帅周亚夫是“真将军”。细柳原位置以今西安市长安区细柳为中心，在镐京以南，沣惠和兴隆以北，郭杜以西，沣河以东。

毕原 位于西安西南约15公里处，又名毕陌。其境域很广，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皆葬此原上。

凤栖原 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附近的高地。东接少陵原，西至勋阴坡，又名栖凤原。今西安地铁2号线设有凤栖原站。

洪渎原 位于渭河北岸，是渭河、泾河的分水岭，亦名咸阳原，“洪渎”之名，始于唐代。这里是由汉至唐的重要墓葬区。西汉皇帝，绝大多数都埋葬于此。2013年，在原上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附近的邓村还发现了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二）

西安这个地方，除了具有上述比较良好的自然条件外，区位优势也相当明显，而且随着时代、形势的变易，具化为不同的内容。

首先，这里在古代是建都的最佳地。

唐代诗圣杜甫《秋兴八首》之六有句云“秦中自古帝王州”，意谓关中（确指当为西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都城的所在地。无疑，这句话并非凭空想象之辞，而是有其确切的事实依据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周、秦、汉、唐几代，皆在西安建都，之外，禅汉的新莽，统一的隋朝，以及分裂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也均建都于此，另，东汉末一度迁都于此，西晋亡前曾暂都于此。总计起来，截止到杜甫生

活的时代，先后有13个王朝或建都、或迁都、或暂都于西安，时间长达千余年。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杜氏才发出了“自古帝王州”的感叹。

历史上那么多的王朝，为什么如此近乎扎堆式的以西安为都？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西安在古代具有建都的太多优势，各个王朝权衡利弊，不能不把都城建在这里。此中，西汉王朝定都关中的经过，无疑是最典型的实例。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将国都选定在雒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地理上的原因。原来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丰沛人（今江苏徐州北），而追随他打天下的左右大臣亦主要为山东人^[1]，建都雒阳，相对靠近他们的家乡。二是心理上的原因。时人认为雒阳居天下之中，周王室自平王迁都于此之后，绵延五百余年，而秦处关中，历二世十多载即亡，因此汉君臣普遍存在一种心理：“与周室比隆”，“不如都周”^[2]。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位名叫娄敬的车夫，竟大胆批评刘邦建都雒阳的错误，并献西都关中之策。娄氏本是齐人，在他赴陇西戍边路经雒阳时，通过老乡虞将军求见刘邦。应该说，娄的运气不错，贵为皇帝的刘邦还真的接见了。他。

娄敬首先针对汉君臣要“与周室比隆”的心理，阐述了周、汉两代立国的不同，指出不能简单“比隆”的道理。接着便向刘邦分析了关中的地理、资源优势，以及在此建都的好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3]最后，他又打比方说：“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搯”就是“扼”的意思；“亢”即是喉咙。这就是说，在关中建都，立足于秦之故地，就好比扼住了天下的喉咙。

娄敬的这番建言，既有道理也很实际。刘邦颇为所动，但却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在群臣几乎清一色的反对声中，惟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雒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束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5]大家知道，张良是西汉开国的第一谋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其所长。他的分析，终使刘邦下定决心，“即日驾西都关中”^[6]，并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

[1] 此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地理概念。当时称崤山、函谷关以西为“山西”或“关西”，以东为“山东”或“关东”。

[2]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19、2121页。

[3]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0页。

[4]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0页。

[5] 《汉书》卷四十《张良传》，第2032—2033页。

[6]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1页。

刘氏。时值高帝五年（前202）夏五月。

次年，有位叫田肯的人再次向刘邦阐述了建都关中的价值和意义。田指出“秦，形胜之国也”，其河山之险，使与诸侯悬隔千里，只需两万人马，即可敌得诸侯百万之众；一旦要对诸侯用兵，“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翎水也”。刘邦听罢连连称“善”，并“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1]

以上所罗列的娄敬、张良、田肯三人关于西安地区适于建都的论述，可谓经典之论。它最清楚不过地向人们阐明了西安在古代何以是建都最佳地的原因。

第二，五代以来这里一直是西部重镇。

唐王朝把我国古代社会推向了空前鼎盛，却也结束了西安建都的历史。自五代开始，因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北迁，西安辉煌不再，但仍不失为中央政权掌控西北、西南地区的重镇。而且由于其千年京师的光荣经历，使之具有甚为特殊的区位优势。对此，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所撰《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二《陕西方輿纪要·序》中曾发感慨曰：“陕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过去有人认为这是唯地理形势论，实际上顾氏所言，是对陕西这样一个四塞为固特定地区历史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既充满感情，也不失理性，在冷兵器时代，确有相当的正确性。要之，就是说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不论作为都城，抑或作为地区重镇，均占据明显的地利。

正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在西安的非都城时代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即最高当局对西安地区另眼相看，给予格外的重视。其具体做法，唐以前大抵是将西安地区（习称三辅）予以政治升格，划归京畿范围，以示尊崇。如东汉便把关中与京师所在的河南尹共同算作京畿，同辖于司隶校尉部，即典型的例子。唐以后基本是慎选至亲镇守西安，以示地位特殊。例如晋武帝司马炎石函规定，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元、明两代开国皇帝，均将仅次于皇太子的儿子封王关中，等等。尤其明代，甚至连“秦王”这一封号也不轻易许人。这里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实例，说的是明末原属张献忠义军的孙可望部，欲归附南明桂王朱由榔共同抗清，要求给以秦王的名义，不料桂王左右认为别的任何王号皆可，唯秦王不行。由此可见在时人心中，秦王名号的重要与特殊。

当然，还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建都在非西安地区的王朝，不少都曾显露出打算迁都西安的强烈愿望。如果说建武十八年（42）刘秀巡行关中滞留长达两个月，令关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2]，只是一场政治虚惊的话，那么宋太

[1] 上述田肯事见《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9页。

[2] 《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98页。

祖赵匡胤誓言“终当居长安耳”^[1]，则是实实在在的帝王亲口明确表态了。及南宋建立之际，迁都之议再起。当时宰相李纲建言宋高宗迁都长安，虽说没有实现，却也激起不小的政治浪花。延至明初，朱元璋又曾一度打算迁都长安。应该说，这都反映了最高当政者对古都长安的无限崇拜和向往，也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无穷都城魅力的真切表现。

如此一种特殊情结，竟还直接延续到现代。大家知道，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1932年3月初，中华民国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以西安为战时陪都，定名西京，启动筹备工作。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西京筹备工程并未停止，直到抗战结束方告一段落。这一史实表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西安的都城功能又曾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也足以反映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西安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一旦遇到机会，它就会登台亮相，演绎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上述种种，如果换个角度看，岂不正好说明了自五代以来西安作为中央政权掌控西北、西南重镇地位的特殊么？而这种特殊性，也正是区位优势之所在。

第三，在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这里是“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新中国建立后，西安作为西北大区最发达的城市，成为大西北发展的龙头。随着国家的发展，西安先后编制了四次城市总体规划并做了城市定位——

1953—1972年的首轮总体规划，规定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城市定位为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业城市。1980—2000年的第二轮总体规划，以经济恢复为重点，城市定位——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学、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1995—2010年经济转型时期的第三轮总体规划，城市定位为：将西安建设成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深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2008—2020年第四轮总体规划中，城市定位由“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改为“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同时提出“并将逐步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城市”的目标。2009年，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批复通过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12年8月，西安市委、市政府启动建设西安渭北工业区。2014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在陕西设立我国第七个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为此，2013年国务院批准西安市对第四轮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回顾西安历次总体规划的城市定位，不难看出它明显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其中历史文

[1] 《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

化的分量不断加码。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昔日丝路起点的西安，作为整个欧亚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区位优势，在当前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中，西安被定位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如此，就把西安放到与上海、深圳同样的战略高度。这对西安而言，自然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不难预料，素有浓厚长安情结和复兴汉唐盛世梦想的西安人，一定会很好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将西安的区位优势予以充分发挥——其集中到一点，也就是所说的西安“一高地六中心”建设，即把西安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贸易中心、制造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金融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或者用更简洁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将西安打造成中国向西开放的试验田”。

（三）

西安的历史发展，今天来看起码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时期。考古陆续发现的半坡、鱼化寨、姜寨、杨官寨等原始文化遗址，向人们揭示了西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面貌。而临潼骊山一带关于女娲的传说、蓝田华胥镇关于华胥古国的传说等，也都反映了西安远古历史的某些有价值的片断。

从文献关于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的记载来看，夏的势力已经到达西安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区燎原村北发现的老牛坡遗址，表明西安地区亦存在相当可观的殷商势力。周人起家陕西，东进灭商，以丰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天下，从而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一个高峰。

秦人源于东而兴于西。^[1]自秦襄公始国之后，秦人即东进在岐、丰之地发展，历经穆公争霸，献、孝两代求强，商鞅变法，直到始皇平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二个高峰。

西汉帝国创立了一个以“匹夫而有天下”和“布衣卿相之局”为特色的“大变局”新时代。^[2]其毅然“西都关中”，定名长安，开辟沟通东西两大文明的丝绸之路，历十二帝二百余年，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三个高峰。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五个分裂时期的王朝，以长安为都，累计时间达百余年，西安历史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继续前进。

隋唐时期，西安历史发展迎来了第四个发展高峰。特别是唐代，则达到了顶峰。雄伟壮丽、繁荣发达的京师长安，万邦来朝、万民敬仰，尽显民族大融合结出的丰硕成果，满

[1] 说详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三期。

[2] 此用清人赵翼说。详氏著《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载经济文化交流国际大都会的历史责任，代表了东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博大包容、开放进取的唐长安气象，谱写了西安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页，同时也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页。

五代以降，西安不再具有京师的地位，但却以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央政府控驭整个西部特别是西北的中心。自五代至清亡的千年中，西安不仅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而且对于近现代关中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们所见到那些关中民风、民俗，以及精神风貌等，应该说大抵都是这千余年逐步形成的。

西安以最先响应辛亥革命、实现光复的形象而迈入民国时期。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西安又成为阻遏日寇西进的中心。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突破潼关天险、进入西安，实现消灭共产党、逼降国民党的战略企图，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新中国的成立，使西安获得新生，由此西安历史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今天，勤劳智慧的西安人民锐意创新、改革进取，正在努力为把西安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拼搏奋斗。一个现代、绿色、开放、和谐、人文昌盛、环境优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大西安，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以上是粗线条勾画的一个西安历史演进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总结西安历史特点的话，那么，以下的几点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

第一是“悠久”。前文曾指出，西安的历史起码可追溯到蓝田猿人时期。据科学探测我们知道，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开端百万年前的西安历史，说“悠久”是其特点，应该没有过分之处。即便是西安的文明史，其肇始最迟也当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同样堪称悠久。中国城市史，能够像西安这样渊源久远者，并不多见。

第二是“辉煌”。西安历史“辉煌”的特点，是与其建都史紧密相连的。大家知道，周、秦、汉、唐是中国历史上被世人公认为辉煌的朝代，它们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而这几个辉煌的王朝，均建都于西安，以西安为统治中心。所以这些王朝的辉煌，也势必与西安难解难分，成为西安的辉煌。不论是周的礼乐文明，秦汉的制度文化，抑或是唐帝国博大开放的气势、诗园艺苑的风韵，无一不是出自西安而传之全国，从而造就了令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辉煌。

第三是“融汇”。这个问题较前述两点复杂，需要稍作展开论述。

所谓“融汇”，就是融合的意思。其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一直都是主流，也是显著特点。以丰镐为都的周人灭商，其间就意味着商、周两族的融合。秦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实际就是不断同当地诸多戎狄部族融